

# 中国思政教育与美育的交融变迁研究

汤文博

(安徽蚌埠技师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蚌埠科技工程学校 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思想史与教育史的双重路径, 系统梳理中国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与审美教育从古至今交融互渗的复杂变迁历程, 并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中国化及其当代实践。研究首先回溯中国深厚的“美善”关系思想谱系, 辨析儒家“尽善尽美”的伦理本位、道家禅宗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近现代西方美学的冲击。在此基础上, 论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 特别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创造美”及“艺术属于人民”的论述, 如何自20世纪以来深刻塑造了中国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实践范式。研究指出, 这一融合经历了从古典“比德”、革命时期“载道”到当代追求“润心”的模式演变。通过对当前“课程思政”与“以美育人”政策的审视, 本文批判性分析了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教育环境中, 二者融合面临的“简单政治附庸”与“空洞娱乐化”风险。最终, 文章论证中国思政与美育的关系呈现“善统摄美”到“美善分离”再到“美善协同”的辩证发展轨迹, 其当代意义在于汲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智慧, 构建一种“以美养善、以善立美”的、扎根中国土壤的育人新生态, 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深厚的历史合法性依据与创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美育; 马克思主义美学; 美善关系; 课程思政

## 引言

以“课程思政”建设和“五育并举”为引领, 中国教育正致力于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审美教育深度融合, 旨在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这一时代命题根植于中华文化“美善相济”的悠久传统, 并历经近现代以来,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深刻重塑。然而, 在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代教育环境中, 效率至上与功利化思维可能导致“思政+美育”的实践异化, 使其面临沦为形式化附庸或空洞娱乐的风险。

所谓“工具理性盛行”, 即是指过度强调手段的有效性与目标的功利性, 而忽视教育本身的价值理性与育人本质。因此, 本研究旨在跨越古今, 系统梳理二者交融互渗的思想脉络与实践变迁, 辨析从古典“比德”、革命“载道”到当代“润心”的模式演进, 以期为破解现实困境、构建“以美养善、以善立美”的育人新生态, 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创新的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 本研究主要采用思想史与教育史相结合的文献研究法与历史分析法。通过对经典文本、教育政策与历史实践的梳理, 勾勒二者交融的思想谱系与制度变迁。同时, 辅以比较研究法, 辨析“比德”“载道”“润心”三种模式的异同与演进逻辑。研究的理论立场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 旨在揭示“美善”关系变迁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 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审视当代融合价值的根本尺度。本文的分析路径是: 首先廓清思想资源, 其次梳理制度化历程, 进而抽象出历史模式, 最终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求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 一、中国“美善”关系的思想谱系及其现代转型

---

**作者简介:** 汤文博(1979-), 女, 研究方向为安徽省中等职业教育, 中职思政课程设计, 中职舞蹈美育改革。

### 1.1 古典传统：“伦理本位”下的美善共生与张力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特别是儒家，确立了“美善相乐”但“善统摄美”的基本关系结构。孔子评价《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评价《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清晰地树立了以伦理道德（善）为最高评判尺度的艺术标准。在此框架下，美（艺术形式）的价值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彰显、促进和教化善（道德内容）。荀子进一步提出“美善相乐”，强调合乎礼义的审美活动本身能带来道德愉悦，实现教化功能。这种“伦理本位的美学”塑造了古代教育“礼乐相济”的传统，乐教从属于礼教，审美是达成道德人格完善（成圣成贤）的优雅路径与辅助手段。与此同时，道家与禅宗思想则提供了另一重维度。道家“道法自然”、“大音希声”的观念，禅宗对“意境”、“悟”的追求，共同强调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与僵化道德条规的审美精神自由。这对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功用的美学构成了某种补充与平衡，使得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在强调社会伦理功能的同时，也保留了对个体精神超脱与生命境界提升的关切，形成了内在的张力与丰富性。

### 1.2 近现代冲击与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引入

中国近代时期，西方美学思想的涌入（如康德“审美无利害”、席勒“游戏说”）猛烈冲击了传统的“美善合一”观。王国维、蔡元培等先驱大力倡导美育的独立价值，蔡元培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将美育提升到塑造完全人格、超越现实利害的崇高地位。这使得“美”在某种程度上从“善”的附庸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自主性。然而，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相对超然的美育观，在民族危亡与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很快与更具实践性、社会性的思潮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美育思想提供了全新的、革命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向，成为重构“美善”关系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非一个孤立的部分，它深植于其历史唯物主义与关于人的解放的总体理论中。其核心要义在于：第一，“劳动创造美”。美不是神秘的或纯粹精神的，而是人类感性实践（劳动）的产物，这为理解美的社会历史性奠定了基础。第二，“艺术属于人民”。艺术不应是少数人的玩物，而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赋予了艺术与生俱来的大众性和人民性立场。第三，审美与艺术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与其他方式（理论的、实践的等）相辅相成。第四，终极理想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有条件成为艺术家，实现劳动与审美、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这些观点，尤其是艺术的人民性、实践性和与社会革命目标的关联性，被中国的革命者与知识分子所迅速接纳和转化。它使得“美”与“善”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历史维度上被重新整合：这里的“善”，不再是抽象的封建伦理，而是指向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最大的历史之“善”与道德之“善”。艺术（美）由此被赋予了参与伟大历史实践、教育动员人民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育）思想系统化、纲领化，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确立了革命时期直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根本指导原则。这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以革命政治为导向的“美善”关系模式的诞生。

## 二、美育与思政融合的制度化历程

### 2.1 古代至近代：从礼乐教化到经世致用

在古代官学与书院体系中，“乐”是“六艺”之一，但其教学核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技能，而是通过仪式化的音乐、舞蹈（如“佾舞”）来规范行为、陶冶性情、强化等级秩序，实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的治理与教化目标。这是一种将审美活动完全制度化为道德政治服务的典型。晚清民国时期，在新式学堂中开设的“图画”、“乐歌”等课程，被赋

予了“格致”（科学观察）、“军国民教育”和“德育”的新使命。学堂乐歌常填入富国强兵、爱国御侮的歌词，美术教育也强调写实以“观察万物”，审美教育成为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工具，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下美育与民族国家道德建设的紧密结合。

## 2.2 革命与建设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范式的确立与强化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中国化实践的关键成型期。革命根据地利用秧歌剧、木刻版画、革命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育。这些作品主题鲜明，直接反映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革命英雄，艺术形式力求通俗易懂。在这里，美育已完全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洪流，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种“革命文艺”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全面推广和制度化。美育（当时常称“艺术教育”）被明确纳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但其核心任务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创作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和工农兵的作品。学校美育课程也高度强调思想性，内容紧密配合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宣传。这一时期，美育与思政的融合达到了空前紧密的程度，但融合的方式主要是“思政内容”对“美育形式”的全面主导和灌注，形成了一种高度一体化的“载道”模式。

## 2.3 改革开放以来：本体回归与深度融合的当代探索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和“美育”重新被写入国家教育方针，其独立育人价值得到重申。美育逐渐从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中部分解脱出来，向“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开发创造力”的本体功能回归。从“素质教育”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提出，美育作为“五育”之一，其与德育（思政教育）的关系被重新定位。二者不再是简单的“载体”与“被载物”的关系，而是被视为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育人维度。特别是新时代以来，“课程思政”理念要求所有课程（包括艺术类课程）都要承担价值引领功能，“以美育人”则要求挖掘美的思政元素。这推动了一种新型融合模式的探索：即不再满足于在艺术课中简单加入政治口号（“旧载道”），而是追求通过精湛的艺术体验、深刻的文化理解、崇高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浸润心灵、坚定信念、陶冶品格，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润心”效果。如何实现从“硬载道”到“软润心”的升华，成为当代教育实践的核心课题。

## 三、“教化”的三种历史模式及其演变

### 3.1“比德”模式：古典的隐喻与象征

中国古典美育与德育融合的经典机制其特点是以自然物（如玉、竹、梅、兰、松）或艺术意象的某些特征，来比拟、象征人的道德品格。例如，以玉的温润比附“仁”，以竹的挺拔中空比喻“正直虚心”。在此模式中，审美对象（自然美、艺术美）本身并非直接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文化编码，成为道德观念的象征符号。教化的实现，依赖于受教育者对这套文化象征系统的认同与联想，从而实现从审美直观到道德认知的迁移。这是一种含蓄、优雅且富有文化底蕴的融合方式，其基础是共享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

### 3.2“载道”模式：革命的宣传与灌输

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前主导性的融合机制直接源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其特点是将明确、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直接注入到艺术形式之中。艺术形式在此主要充当“容器”或“传送带”的功能，其自身的审美规律有时需让位于内容的清晰性与宣传的有效性。例如，革命样板戏、宣传画、政治抒情诗等。这种模式目标明确、动员力强，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风险在于，容易导致艺术的公式化、概念化，削弱其审美感染力，甚至引发接受者的逆反心理。

### 3.3“润心”模式：当代的浸润与生成

当前“课程思政”与“以美育人”理念所倡导的理想融合机制应如是也。它追求的不是直接“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而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富有思想深度的审美体验（如欣赏经典艺术作品、参与创造性艺术实践），让学生在感知美、创造美、评判美的过程中，自主地激发积极情感、反思生命价值、理解历史文化、认同崇高精神。当代丰富的教育实践，为“润心”模式提供了鲜活注脚，展现了价值观在深度审美体验中“内生”的多种路径。

其一，是“行走的思政课”与艺术创作的深度融合。2025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开展了一场跨越7省9市、行程近9500公里的“写生路上的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首次集体加入写生队伍，带领学生在皖南古村落、甘南腊子口遗址、景德镇窑火旁等实地，将艺术采风与社会调研合一。油画系学生田焜元在腊子口遗址，被先辈事迹触动，创作了油画《春满人间》，以格桑花为意象连接历史与当下。这种“艺术在场+思政铸魂”的模式，让学生在对祖国山河与人民生活的切身观察和艺术描绘中，自然生发出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实现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同频共振。

其二，是戏剧教育作为“过程性体验”对同理心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2025年7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花开”团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世纪学园开展暑期实践。面向初中生，团队选取了反映民族团结主题的话剧《国家的孩子》（讲述“人民楷模”都贵玛抚养28名南方孤儿的故事）进行排演。学生们从零基础开始，在理解角色、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深度浸入了这段历史与情感。随后，师生们专程拜访了故事原型都贵玛老人，将舞台上的演绎与真实人物的崇高精神相印证，上了一堂无比生动的“爱与责任”思政课。这一案例表明，“润心”模式不仅在于观看演出，更在于引导学生在戏剧创作、排演的全过程体验中，自主建构对崇高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

## 四、历史资源、现实困境与创造性转化

### 4.1 当代融合的现实困境

一是“简单化回归”风险。在强大的绩效考评与工具理性思维下，美育与思政的融合容易滑向新的“载道”模式，变成给艺术作品贴政治标签，或在艺术课上生硬加入思政片段，导致融合生硬、肤浅，既损害了艺术魅力，也削弱了思政效果。二是“娱乐化稀释”风险。另一方面，为迎合学生兴趣，部分实践可能过度追求形式新奇有趣，而忽视了价值引领的深度与高度，使美育沦为浅薄的娱乐，思政目标落空。三是“专业性割裂”障碍。思政教师可能缺乏艺术素养，艺术教师可能对思政元素挖掘不深，导致二者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两张皮”，难以实现有机化合。

### 4.2 历史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破解困境，需要从丰厚的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寻求启示。首先，重拾“比德”智慧。不是机械地套用古代比喻，而是学习其通过形象、意象、意境来传达价值观念的思维方式。在当代，可以挖掘更多富有时代特色的审美意象（如科技创新之美、脱贫攻坚画卷、生态和谐景观），构建新的“比德”话语，让价值观可感、可亲。其次，深化“润心”实践。这要求教育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掌握世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真正尊重审美规律。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深入分析经典作品的形式美与思想内涵的辩证统一，在创造性艺术实践中感悟集体协作、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让价值观在美的探索与创造中自然生成。最后，坚守“人民性”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当代融合应引导学生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人民，创作和欣赏反映人民火热生活、传递人民心声的作品，在审美中厚植家国情怀与人民情感，这是最根本、最鲜活的思政教育。

#### 4.3“三维协同”的实施机制

为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跨越,需构建一套“三维协同”的实施机制。一是课程层面的“深度融入”机制:开发“美育思政元素库”,为不同艺术门类课程提供与专业内容深度咬合的价值切入点教学设计指南,避免“贴标签”。推广“双师协作”模式,鼓励思政教师与艺术教师共同备课、同堂授课。二是教学层面的“体验生成”机制:教学设计应从知识灌输转向情境创设与活动引导,广泛采用项目式学习、审美探究工作坊、批判性艺术讨论等方法,保障学生在深度审美参与中实现价值体认。三是评价层面的“综合评估”机制:超越对技能或知识点的单一考核,设计能够反映学生审美判断力、价值辨识力及创造性表达能力的综合评价方案,如运用作品集、实践报告、反思日志等,关注价值观内化的过程性证据。

### 结论

中国思政教育与美育的交融变迁,是一部“美”与“善”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下不断被界定、调整与重构的思想史与实践史。其核心线索呈现为一个辩证发展的历程:从古典时期“善统摄美”下的和谐共生(以“比德”为机制),到近现代受西方冲击一度出现“美善分离”的倾向,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以革命政治之“善”强势整合艺术之“美”,形成“政治统摄美学”的“载道”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随着对教育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认识的深化,二者关系正朝着一种更高级的“美善协同”方向发展,追求以“润心”模式实现有机融合。

这一历程的当代启示在于:思政教育与美育的融合,绝不能是机械的“内容加法”或形式的生搬硬套。它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上,更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艺术人民性、实践性与人的解放的坚实理论基础上。真正的融合,应致力于构建一种“以美养善、以善立美”的育人生态。在这里,“美”以其形象性、情感性与自由性,滋养、丰富和活化“善”的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善”则以其方向性、思想性与崇高性,引导、提升和照亮“美”的境界,使其不流于空洞与浮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教育中培养出既有坚定理想信念与高尚道德情操,又具备丰富情感、卓越审美素养与旺盛创造力的时代新人,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之路的独特优势与光明前景所在。

本研究侧重于宏观思想脉络与模式演进的历史梳理与理论建构,属于基础性研究。其局限性在于,对当代大中小学不同学段、不同区域“美育思政”融合的微观实践样态、具体成效及影响因素的实证考察尚显不足。此外,对于数字时代新媒体艺术、网络审美文化如何影响青少年价值观,并给二者融合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的探讨,亦有待深入。未来研究可在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开展深入的质性案例研究或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对“润心”模式的有效性及其条件进行实证检验;二是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其他文明传统中审美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合的经验,为中国实践提供更广阔的参照视野。

### 参考文献:

- [1] 方华,王宇,王昕欣.“大思政”视域下全面拓展美育实践的路径探析[J].科教文汇,2026,(01):36-39.  
DOI:10.16871/j.cnki.kjwh.2026.01.009.
- [2] 王晓露.红色基因融入高校美育思政教育实践探究[N].固原日报,2025-12-30(003).
- [3] 黎梦莹,李晶,林恒宣.探索职业教育中美育融入思政教育的创新与应用研究[N].重庆科技报,2025-12-25(026).
- [4] 王惠琴.文化自信视域下高职美育思政的价值意蕴及实践探索[J].美术教育研究,2025,(24):120-122+138.
- [5] 李暮凡,王新瑛.历史题材影视剧融入高校美育教学的思政元素[J].三角洲,2025,(20):207-209.

- 
- [6] 冯鸣阳,周飞.智媒时代本土党史文化资源融入上海高校美育课程思政地教改探索[J].创意设计源,2021,(03):4-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and 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TANG Wenbo

(Anhui Bengbu Technician College,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Bengb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chool,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omplex evol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inic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Marxist aesthetic views. The study first traces China's profound ideological lineag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distinguishing the ethical orientation of Confucianism's pursuit of "exhaustive goodness and beauty," the quest for spiritual freedom in Daoism and Zen Buddhism, and the impact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s core contribution lies i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ow Marxist aesthetic thought, particularly its discussions o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labor creating beauty," and "art belonging to the people,"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practical paradigm of integr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is integrat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moral analogy," revolutionary-era "moral conveyance," to contemporary pursuit of "nurturing the hear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current policies o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ng through beauty," this paper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risks of "simple political dependency" and "hollow entertainment"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dominat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Ultimate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demonstrated a dialectic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from "goodness dominating beauty," to "separation of beauty and goodness," and finally to "synergy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es in drawing on the wisdom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o construct a new educational ecosystem rooted in Chinese soil that "nurtures goodness through beauty and establishes beauty through goodness," providing a profound historical legitimacy basis and innovativ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Marxist aesthetics;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